

消除另一种贫困——社会贫困

To Eliminate Another Poverty——Social Poverty

吴忠民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济南 250100)

发展的目的不仅要消除经济贫困,还应消除社会贫困。对于前一点,人们是比较熟悉的。而对后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社会贫困是指社会性生活水准的低下,具体说就是:(1)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稀缺与发展能力的不足;(2)社会机体中人文含量的不足;(3)社会救助与保障水准的低下。

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是,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大量的社会贫困问题,有时这些问题还表现得比较突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要原因而言,大致有这样几项:其一,经济基础落后。虽然我国的经济近十几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经济发展水平仍属于落后国家之列,远没有消除经济方面的贫困。经济的贫困是造成社会贫困,尤其是绝对社会贫困的根本原因。社会物质财富的稀缺,必定会使人们缺乏消除社会贫困的有效方式与途径。其二,社会的转型。当今我国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转型时期,落后的旧式经济因素与先进的现代经济因素并存,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因素并存。社会的转型,还意味着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意味着各个社会群体利益之间摩擦的日趋加重。这一切,便造成了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行为取向以及价值观念之间的种种差异。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就必须兼顾社会成员的种种不同要求,这样整个社会就很难形成一套同一性较强、整合程度较高的社会目标体系。而社会目标体系内部的抵触与矛盾,不可避免地又会为原有社会贫困的存在留有余地,同时,还极有可能造成一些新的社会贫困问题。其三,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必须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消失,更为重要的是,由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种种结果并没有从总体上消失。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工具方面(如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本体亦即社会结构、社会与民众的内在取向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之间的严重脱节。计划经济体制忽略了现代化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它把人仅仅视为庞大的

计划体系中的一个部件,依靠行政体制与一统控制来维系社会。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会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以低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高度的封闭性以及禁欲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它必定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贫困问题,如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匮乏,平均主义式的分配方式,等等。

一、社会贫困的表现形式

当前我国的社会贫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社会分配不公

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机会的稀缺导致了分配上的不公。一方面是贫富悬殊过大。1992年,全国年收入3万元以上的高收入户有430万户。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国城镇居民三人户家庭人均收入在1990年为1678.13元;1991年全国农村中约9.4%的农户人均收入不足300元。另一方面,则又是平均主义的加剧。1990年,高级工程师家庭人均收入为1894.06元,工程师家庭为1734.79元,助理工程师家庭为1640.06元,技术员家庭为1605.75元,处长及以上干部家庭为1783.62元,科长级干部家庭为1664.91元。这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远远超过1978年以前的平均主义。分配不公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城乡差距在不断拉大:1978年以前工、农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两者之间的对比度在1977年为2.9:1;1982年后两者差距开始下降,1985年为2.2:1;80年代中期以后,又被拉大,到1990年骤升至2.8:1。

2. 社会环境质量水准下降

近十几年,中国物价总指数的上升幅度之大,为建国40多年来所仅见。受其影响,职工生活费用价格的总指数也在迅速上升,其增幅甚至超过了零售物价总指数的上升幅度。以上年为100,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1978年为100.7,增幅很小,1980年则增到107.5,1985年为111.9,1988年为

120.7。到1993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前一年上升13%,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升14.5%,其中35个大中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升19.5%。1994年物价涨势更猛,上半年零售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竟高出19.8%。物价的迅速上升,直接危及到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

社会公众的安全问题在这些年里也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1982~1988年,全国案件增幅很大:按指数计算,以1982年重大案件数目为100,1983年为101.8,1984年为99.5,1985年为130.6,1986年为152.8,1987年为191.0,1988年为316.6。另外,社会病态现象大量出现,如腐败行为的加剧;还有“六害现象”即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封建迷信活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和发展着。

3. 社会中人文含量明显减少

短期性、功利性的行为对于我国文化教育领域的冲击是巨大的。教育状况令人担忧:在我国2.2亿学生中,只有1/3左右能读完小学;1980年至1988年全国学生累计流失数量达3700万人;1992年,全国流失的教师约45万人;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用于教育设施方面的经费更少;教师待遇低下,甚至教师的工资都不能如数发下,被拖欠的工资一度高达20亿元。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愈来愈低,这与经济收入较大幅度的提高形成鲜明的对比。1992年,全国人均用于书报杂志的费用仅13.11元。高层次科学研究、严肃文化、高雅艺术愈来愈没有市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在趋向于合理化、多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紊乱的情形。不少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如拜金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观念流行于社会生活之中,扭曲了许多人的行为取向,淡化了许多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成员的公德意识、职业道德也往往呈现出一种“虚无”状态。

4. 社会防护能力不足

任何一个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社会成员都有可能面临许多社会风险,这就需要社会提供救助和保障。我国处在转型时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利益结构的调整,相对来说有更多的社会成员会失掉工作的机会,或者会遇到其他方面更多的风险,这就更需要社会给予救助和提供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社会防护能力理应超前一步重点加强,形成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方可满足转型期社会的实际需求。但实际上我国目前的社会防护能力较弱。我国社会劳动者中有2/3的人没有进入“安全网”。就是进入“安全网”的社会成员,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不可能完整地得到社会在养老、生育、疾病、失业、工伤等多方面的救助与保障。城市中社会劳动者所享受的社会防护与救助的项目要远远多于农村的社会劳动者。农村中社会劳动者所

得以享受的社会防护与救助项目主要限于“社会养老保险”,相对城市而言,很少有人能享受其他方面的社会防护与救助。再者,我国的社会防护与救助问题还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给予系统的立法,其社会化程度较低,因而各地区、各行业有关规定之间的差别往往过大,随机性过强,透明度也不够。

5. 职工的某些“贵族化”倾向

这是社会贫困问题在当今的特殊表现。经济的落后,社会的急剧转型,使社会成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保心理,再加上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分配体制仍在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职工的某些“贵族化”倾向。这种“贵族化”倾向的主要特征在于非劳动性、食利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准家族化。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增长幅度很不合理:一方面,劳动强度较大而且社会地位不高的部门中职工增幅偏低甚至是负增长,如建筑业中的职工和中小学教育部门职工人数的消长即为典型之例;另一方面,在劳动强度不大而且社会地位较高的部门职工的增幅相对来说是很高的,比如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职工人数这些年保持了一种剧增的势头。职工的身份往往是比较固定的。只要能成为一名正式职工,诸如收入、福利等各种好处便会一并而至,从而获得一种生产与分配上的终生既得利益。而且,职工的身份往往是融职业、地域、单位一体化。职工很少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甚至是跨单位的流动。职工往往享受着相对高的福利待遇。从1978年始,职工保障福利费用总额急剧增长,1978年为78.1亿元,1990年剧增为937.9亿元,增长了12倍,远远高于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但这种福利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救助与保障。从总体上看,职工的依托体——单位愈来愈具有一种准家族的色彩。单位对职工所负的责任、所承担的义务愈来愈多,似乎是一个融生产、生活、社会、政治于一体的大家族。这些情况说明,职工的某些“贵族化”倾向对于城镇区域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与能力,实际上是起着一种自动抑制的作用。

二、社会贫困的不利影响

社会贫困对于我国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 造成贫血型的发展。

社会贫困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发展进程的后续推动力量,使中国发展进程的推进有时显得乏力、贫血。

第一,社会贫困弱化了社会的整体性动力。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尤其需要一种高度整合的群体精神,需要一种强劲的民族超越精神。而社会分配不公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产生

一种隔阂,甚至是抵触情绪,使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明显减弱,进而也使我国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减弱。这势必会挫伤民众的奋进精神,极不利于发展进程的持续推进。

第二,降低了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合格的劳动者的培养是靠教育领域来承担的。教育并非没有经济效益的消费性投资,而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生产性投资,而且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要超过单纯的物质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根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总共需要专门人才4900万人。但是,令人担忧的教育现状如果不发生重大改观的话,是无法胜任这一重任的,必定要拖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第三,减弱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性投资。一个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起飞,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这就是必须保持较高的生产性投资的比例。我国的发展水准不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而职工队伍的某些“贵族化”倾向的存在,会导致用于职工非正常的福利方面的奖金过高,于是,用于生产性投入的比例就会相应减小。其结果是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

第四,形成一种改革的群体性阻力。本来,改革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现今社会成员往往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提发展,就意味着要得到些什么;而一提改革则似乎是意味着要损失些什么。究其根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职工队伍的“贵族化”倾向的存在。职工队伍“贵族化”倾向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涉及面极广,而且还有“单位”作为依托。因此,改革便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个巨大的群体性阻力。

2. 造成畸形化的发展。

人文含量的减少等社会贫困问题的存在,会使我国的发展趋于某种畸形化的状态。

第一,有可能造成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异化现象。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社会机体中的人文成分直接影响到社会机体存在与发展的定向。而人文含量的减少,无疑会使社会的发展出现某种不确定性的情形。这是因为,社会中人文成分的减弱,会助长绝对的经济决定论亦即极端功利主义思潮的抬头。经济因素说到底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因而若不主动地加以把握,就极有可能具有一种导致社会被动的自发性。从一定意义上讲,纯经济性的因素有着自己特定的多种潜在指向。这些潜在指向有的与人的需要是一致的,有的就不见得一致了。而后者若不及时地加以控制,便有可能变为现实的东西。一旦如此,经济本身反倒会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重要的是,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物质的总能量在急剧增大,其潜在的不可控制性也在增大。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如若失控,其后果将更为严重,完整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将不可能实现,社会

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

第二,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建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发展进程得以正常、顺利推进的必要保证,是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发展过程中工具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本体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两者相互脱节问题的主要途径。多样化的市场行为主体和明确的产权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是,职工队伍某些“贵族化”倾向所带来的单位化和职业固定化毫无疑问是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相抵触的。因此,只要是存在着这一类的社会贫困现象,市场经济体制便很难真正得以确立,或者说很有可能走样,从而使我国发展进程中工具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本体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之间总是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

3. 造成摇摆性的发展。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只要不超过一定的界限,一般来说,可以不为人们所特别重视。但是,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由社会贫困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负作用便大不相同。贫富差距的悬殊、城乡差距的拉大等社会不公现象,无疑会加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抵触。社会环境质量水准的下降,再加上社会救助与保障能力的低下,必定会加重社会成员业已存在的焦虑心态。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紊乱、行为取向的混乱,又会使社会民众难以一致地认同发展的目标体系,进而降低发展目标体系的稳定性、配套性和同一性的程度。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社会问题滋生的机会,并程度不同地使现实社会问题所造成的负作用更为加重。而众多的社会问题一旦汇集到一起,就极有可能产生一种“并发症”效应,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某种社会性的大动荡,我国的发展进程就极有可能或者是变得缓慢,或者是受阻停顿。这样,伴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解决或是缓解,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重新形成,我国的整个发展进程便显出一种走走停停的状态,亦即一种摇摆性的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我国的发展不应仅着眼于消除经济贫困,不能简单地用消除经济贫困来取代消除社会贫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果社会贫困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也就不可能得以正常、顺利、健康地推进。因此,消除社会贫困,同样应当成为我国发展与改革的目标取向。

我们承认,消除社会贫困的基础性条件是消除经济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可以自然地带来社会贫困的消失。同样,我们承认,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贫困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贫困的长时期存在是合理的。消除社会贫困,应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就此而言,至少可

(下转 30 页)

计,软件费用占整个计算机系统费用的比重,60年代为50%,70年代为80%,80年代末为90%。目前的情况是软件的发展跟不上硬件发展提供的条件,对软件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软件业仍然是人力和知识双重密集的产业,需要大批高质量的软件人才;而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已十分有限,最终出路可能是利用我国大陆和印度充裕的人才资源。我国人平均智力高,适于从事软件开发。二是加速发展通信技术和手段,并在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的前提下,进行国家通信网络、公用数据传输网络和多媒体信息综合传输网络的建设。三是大力发展我国的数据库产业。四是大力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为此,当前应抓好三方面的工作:通过改革,把大量的提供传统信息服务的情报、文献、图书机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从事信息增殖的咨询服务上来;建设适量的大型骨干信息提供和咨询服务中心;鼓励信息工作者根据市场需求和专题特长,建立大量的专题咨询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实行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

三、“三金”工程

面对各发达国家竞相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面对信息产业能够创造的滚滚财富,跟上世界潮流,建设我国的信息国道,从而使我国的信息产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既紧迫又现实的任务。

考察各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可以看到,他们都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和发展,赋予更先进、更高速、更有效的全新的硬环境及相应的软配套。

目前我国最重要的信息产业计划,是从1993年开始启动的国家重大电子信息工程——“三金”工程,它包括“金桥”、“金卡”、“金关”三大工程。

“金桥”工程,即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络工程。该工程是以卫星、通信电缆、光缆、微波等多种传输手段实现全国性的和跨国的计算机联网,建立起国家公用信息平台,为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统计和调控,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民生活各方面的信

息交换和共享提供一条“准高速国道”。该工程将把国务院各部委、大部分中心城市以及3000~5000家大中企业联结起来,为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可靠地提供国家有关经济信息和国民经济的数据,对于提高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水平和信息共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卡”工程,即金融电子化工程,推行“信用卡”,包括银行清算系统、联网信息系统和柜台业务系统以及个人的信用卡和储蓄卡。如在3亿城市人口中推广普及信用卡,可以大大减少货币发行量和流通量,减少货币在个人或单位的滞留量,提高资金利用率,简化货币支付手续,使资金利用率和周转速度大大提高。这样,现在资金流通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资金体外循环和偷税漏税都可防止,并能大大提高国家金融机构对资金的宏观调控能力。随着这一工程的实施,到本世纪末,全国的大型商业企业将全面实行计算机管理,各零售商店普遍使用电子收款机,在商业物流环节全面推行条码管理。在联通和完善全国金融业务信息网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广泛实现持卡金融交易,从而使资金周转速度和利用率提高3~4倍。全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将使35个中心城市、420个大中城市、1200个县城的三亿人口实现凭卡纳税和结税。

“金关”工程,即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信息网工程,通过计算机网络对整个国家的“物流”实施高效管理,即通过海关、经贸、金融、外汇管理和税务等部门联网,使海关进出口贸易结汇和退税计算机化,利用信息开展准确核查,以减少损失。目标是采用电子数据交换方式实现国际上已普遍采用的无纸贸易。

不难看出,“三金”工程是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工程,是对我国现有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升级和改造。它的完成不但将大大加强我国与国际信息技术发展的接轨,还将对国内生产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的许多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比重也将有明显提高。因此它是一件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大事。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36页) 以在这样三个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第一,从长远着眼,应把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培育放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重视现代化进程在社会机体中的广泛性和渗透性,注意现代化过程的自然递进性。切忌急躁冒进的短期化行为。第二,健全与完善发展的指标体系,重视发展指标体系中的

社会性要项,从而在具体的作法上防止片面的唯经济论。唯有如此,方有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第三,注意量力而行。消除社会贫困,是一个长时期的、逐步的过程,不应奢望一步到位。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渐完成。

(责任编辑 孙立明)